## 论《面纱》

袁雨

PB20151804

## **面纱**

书名《面纱》取自于 1818 年英国诗人雪莱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别揭开这画帷》。该诗写道：“别揭开这画帷：呵，人们就管这 / 叫作生活，虽然它画的没有真象；/ 它只是以随便涂抹的彩色 / 仿制我们意愿的事物——而希望 / 和恐惧，双生的宿命， 在后面藏躲，/给幽深的穴中不断编织着幻相。/ 曾有一个人，我知道，把它揭开过——/ 他想找到什么寄托他的爱情，/ 但却找不到。而世间也没有任何 / 真实的物象，能略略使他心动。/ 于是他飘泊在冷漠的人群中，/ 成为暗影中的光，是一点明斑 / 落上阴郁的景色，也是个精灵 / 追求真理，却象‘传道者’一样兴叹。”诗人通过将真实与虚假，生活与艺术进行类比，劝诫人们不要将虚假误以为真，生活如同一块彩色的画帷，揭开之后会是种种的宿命与真相。即使了解了真相，也照样会像传道者一样兴叹。按照《旧约·传道书》 的说法，传道者柯希列有言：“凡事都是虚空”。毛姆以此诗为隐喻，试图以冷静的笔触勾勒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在真相与幻相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式的抉择，绝望与希望并存。知道真相后也许会略略心动，但寻找真理的过程确是自我体验和救赎式的，能成为“暗影中的光”才最重要。

如同毛姆的其他小说一样，《面纱》探讨了“冷漠”所导致的“背叛”与“赎罪”主题，又类似于《飘》《包法利夫人》等小说，讲述了丈夫、妻子“三角关系”和“红杏出墙”的故事。容貌娇美而又爱慕虚荣的英国女子凯蒂为了避免自己变成一位老姑娘，接受了自己并不爱的生性孤僻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的求婚。她离开了上世纪20年代伦敦浮华而空虚的社交圈，随着瓦尔特远赴神秘的东方殖民地——香港。对婚姻感到不满和无趣，凯蒂爱上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唐生，并和他偷情。瓦尔特发现了妻子的不忠后，决定举家前往霍乱横行的湄潭府进行行医与研究。在那里，凯蒂每天与死亡和绝望擦肩而过，经历了从未体验过的波澜，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最终瓦尔特也在痛苦的压抑中毁灭，死于霍乱。凯蒂回到英国与父亲和解，并与父亲同往巴哈马群岛生活。

小说向读者能展现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揭开面纱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如此美好而残酷，或许用于遮盖内心的那具皮囊是轻盈的，但皮囊背后的灵魂却如此沉重。而且这面纱是双向的：你用面纱遮蔽他人的窥探，自己也难以一睹世界之真实。

从某种角度上说，毛姆是个极其“凶残”的作家。他总是冷静地、残酷地，把一切人们熟知的美好撕得粉碎，还重重仍在脏兮兮的地板上再踩上两脚，而你却不得不承认那才是生活。在小说中，爱情是怨恨、欲望和背叛，这些和他笔下的宗教、制度、传统、文明和愚昧等等一起，共同交织成一张面纱，揭开之后，那张脸也不见得真的就美丽如初。和凯蒂所承受的各种痛苦，不断地建立、推翻、质疑一样，人生不知还会有多少层面纱等待揭开。毛姆以一种血色浪漫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它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生活也并不是主人公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狗血剧，它有众多幽微曲折，反反复复。毛姆笔下的凯蒂，淡然地接受了自己的罪恶与美好，不夸大，不缩放，不畏惧，也不刻意。也许人性就是如此，需要你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虽然罪恶、欲望与美好纠缠交织，但是它们却不再控制你，剥去一切面纱，一切如旧，却也宛若新生。

## **凯蒂与瓦尔特的婚姻**

在发现凯蒂的婚外情后，瓦尔特曾说：“我知道你愚笨轻浮，我知道你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爱你。我清楚你的追求和理想庸俗不堪，可我爱你。我知道你就是个二流货色，但我爱你。我努力去喜欢那些你喜欢的东西，我把自己隐藏起来，在你面前展示出我无知粗俗、爱嚼舌根、傻里傻气。想想我做得多可笑啊。我知道，你看到聪明人有多么恐慌。为了让你看到我跟你交往的其他男人一样，是个大傻瓜，我竭尽全力、煞费苦心。我知道你只是为了权宜之计才嫁给了我。我深深爱着你，我不在乎这些。据我所知，大多数人付出爱情却得不到回报时，会感到失望，会越来越愤懑，越来越刻薄。我不是。我从没期望你会爱上我，我也没觉得你应该爱上我，我不觉得自己非常惹人喜爱。能爱着你，我就感激不尽了。偶尔，我想到你跟我在一起时感到满意，或者看到你眼神里有一丝愉悦的爱意，我就高兴极了。我尽力不让你厌倦我的爱，可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我还是时刻提防，看你你有没有厌烦我的痴情，不放过一点儿蛛丝马迹。大多数丈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在我这儿，我视作恩赐。”

这段话淋漓尽致得表现了瓦尔特对凯蒂一厢情愿的爱以及凯蒂空洞贫瘠的灵魂。让我们从这段婚姻的开始说起。

凯蒂的母亲贾斯汀夫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但她自己的丈夫却没有飞黄腾达，于是她将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凯蒂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当她开始参加社交出落人前，贾斯汀夫人便使出浑身解数，让女儿得以受邀参加各种舞会，有机会认识各路有为青年。凯蒂果然不负众望，她给人带来快乐，长得又漂亮，不久便吸引一群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直到25岁，仍然没有一个身份和收入都让人满意的人向她求婚。贾斯汀夫人气恼了，毫不顾忌地经常给凯蒂脸色看，也不得不降低标准。这时，细菌学家瓦尔特在一次舞会上进入了凯蒂的视野。这个男人在第一次见到凯蒂时就疯狂地爱上了她。凡她去过的每一场舞会，他都在场，笨拙地和她搭话。一天，瓦尔特终于鼓起勇气向凯蒂求婚，虽然单薄瘦小、沉闷木讷的瓦尔特却根本不是凯蒂喜欢的类型，但为了赶在妹妹多丽丝出嫁前结婚，为了不再承受母亲的冷嘲热讽，为了尽快逃离这个家庭，凯蒂接受了瓦尔特的求婚。

我们可以发现，凯蒂最初的人生观和婚姻观完全继承于她的母亲，她和瓦尔特的三观与性情大相径庭，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凯蒂和瓦尔特的婚姻悲剧。

婚后，凯蒂跟随丈夫瓦尔特前往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开启了她所向往的新生活。凯蒂天性活泼，一整天叽叽喳喳。但瓦尔特沉默寡言，不爱讲自己的事。他喜欢读书、玩桥牌，但凯蒂却觉得很无聊，她喜欢的是跳舞、打网球、看电影。但瓦尔特疯狂地爱着凯蒂，他体贴入微、耐心细致地照顾她，取得她的欢心。这虽让凯蒂心满意足，但也感到滑稽可笑，她从来没见到哪个男人对待妻子这么客气的。

不久后，凯蒂邂逅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不同于谨慎冷漠的瓦尔特，查理热情奔放、风趣健谈，甚至英俊帅气、身材健硕，完全是凯蒂的理想型。更让凯蒂兴奋的是，查理也爱着她。尽管两人均已婚，但激情当前，凯蒂还是和查理走上了偷情的道路。

从两性关系的视角分析。婚姻华丽的面纱背后，其实藏着太多的矛盾体。瓦尔特和凯蒂的三观与性格大相径庭，而婚姻使他俩生活在一起，各种琐事需要共同经历与处理，很容易形成分歧，造成生活的碎裂，双方都很难感到幸福。而且在这段婚姻里，瓦尔特对凯蒂爱得疯狂，凯蒂却对他感到无聊。凯蒂说过：“付出爱才重要，而被爱是不重要的。你甚至不会对爱你的人心存感激，如果你不爱他们，他们只会让你感到厌烦。”瓦尔特一厢情愿地从爱中汲取能量。而凯蒂虽然自愿选择嫁给他，却没承担起选择后的责任，她对这段婚姻越来越失望。所以当凯蒂遇到理想型查理时，她来不及分辨，迫不及待地与他私会，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真正的爱情。她沉浸在幸福中，难以自持。查理经常和凯蒂分享自己的喜悦，比如布政司夸他办事利索，凯蒂对他十分爱慕。而瓦尔特却羞于提起自己的工作，即使他是个伟大的细菌学家。但爱情是需要相互吸引才能维系的，瓦尔特只懂得一味付出，却从不对凯蒂展现自己的魅力。凯蒂在渣男的套路中越陷越深，也越来越瞧不起自己的丈夫瓦尔特。

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父母在子女到适婚年龄时同样会催婚。古代社会里的传宗接代是生存的基本前提条件，演化成现代社会的伦理，一个刚硬的要求。不少人因为害怕被“别人的看法”压垮，将就而草率地应付自己的人生，但是没有应该结婚的年龄，只有水到渠成的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一定要顺应自己的内心。婚姻就像一个房子，房子里充满了自己的体温，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物质。房子的结构、榫卯等都要对得上，才能够牢固，才能够挡风遮雨。很多婚姻摇摇欲坠，因为在结婚的时候没有基本的起点，所以结婚是需要慎重做选择的。如果被外部节奏带着走进一段婚姻，打开的不是爱情，而是不幸。女性也要自己定义爱情，打破传统给自己设定的角色，勇敢地表达爱，而不是一味降低择偶标准。在选择伴侣时，不要怀疑和忽略自己内心的诉求，不要权衡利弊而去相处，否则被你舍弃的“弊”会成为日后婚姻生活中的鱼刺。

从波伏娃“存在主义”下的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波伏娃对人类文明做了深刻的梳理，她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并阐述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贾斯汀夫人虽然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在当时的英国，女人的社会地位全由丈夫的职业所决定，女人只能依靠丈夫成功。所以野心勃勃的贾斯汀夫人想法设法逼丈夫为自己所用，同时寄希望于女儿们找到出类拔萃的好丈夫。波伏娃用“内在性”来描述女性的性别特征，即一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对历史不会产生影响的工作处境，在这种处境中女性处于封闭、被动而无所作为的生存状态。其外在表现最直观的就是女性在经济、文化上对男性的依赖。从凯蒂的成长历程来看，她的“内在性”的形成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里，衡量、评价女性的标准由男性参与制定，女性被要求优雅、美丽、贤惠、顺从……就像凯蒂曾说的那样，她无知、轻浮、庸俗，但她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她认识的女孩子们都这样。凯蒂的言语中透露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中男权思维模式在法律和伦理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凯蒂和身边的女孩子们都把对男性的依赖作为自己的内在准则和观念指导。女性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男性的主体意识，并心甘情愿地处在“他者”身份下。貌美虚荣的凯蒂为了不再看母亲的脸色，为了避免在妹妹的婚礼上显得难堪，一气之下嫁给了老实本分的细菌学家瓦尔特，在婚后难掩内心的欲望，直到遇到查理，奋不顾身地跃入查理编织的爱的陷阱，坠入男人外貌和权力的牢笼之中。

从原始社会开始的悠长历史中，都是女性站在男性后面。从工业革命之后，女性的社会空间打开了，女性可以自己劳作、创造，独立地拥抱这个世界。但即使这样，从工业革命至今，也只有两百多年。女性要面对几百万年来的“他者”身份，如此巨大的遗传，要想要有潜意识的改变，极不容易。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丰县八孩铁链女、唐山性骚扰打人等事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女孩更害怕学理科、女性更容易多愁善感、女性更容易有容貌焦虑等事实。但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所说：“就像一匹马从马圈里走出来，身上带着很多污泥，很多人去说马，但很少有人去反思这个马圈太不干净。”作为新时代女性，我们需要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去争取彻底的独立、去与世界有更完整、更广大的关系。我们需要不再从男性主导的话语权里去表达自己，而是去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凯蒂的觉醒**

奸情败露后，瓦尔特给了凯蒂两个选择，要么跟着他去霍乱盛行的湄潭府，要么让查理离婚后娶她。直到面临选择时凯蒂才发现，查理只在乎自己的前途，她只是他情欲的玩具。就这样，瓦尔特和凯蒂来到了疫病肆虐的中国小镇湄潭府。在这里，每个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负责接待他们夫妻俩的英国官员沃丁顿恰巧认识查理，在他的描述中，查理是个除了魅力以外一无是处的人，经营人缘是他的拿手伎俩，而做事利索多凭他工作卖命。除此之外，他依靠着足智多谋的妻子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凯蒂想到自己把一片真心付给愚蠢虚荣的查理，仅因他那双迷人的眼睛和健美的身材，不禁觉得自己愚笨，感到懊悔。

受修道院长之邀，凯蒂去参观了修道院。让凯蒂未曾料到的是，修女们对瓦尔特大为赞赏，就连慈善庄严的院长本人都对他褒奖有加。沃丁顿也说：“我尊重他。他既有智慧的头脑，又有高尚的人格。若有人能单枪匹马结束这场可怕的瘟疫，此人非他莫属。”只有凯蒂先前未能察觉他的好。她只能鄙视自己，因为她曾瞧不起瓦尔特。但最令凯蒂感动的是那些修女。她们舍弃了一切，只为了全身心投入到奉献和贫困的生活中去，忠顺教会，从事繁重的劳作，祈祷。这让凯蒂深受感动，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之后，凯蒂决定去修道院帮忙，这里的工作让凯蒂精神焕发。刚开始，凯蒂还得克服自己对这些小女孩们的隐隐厌恶，后来，她感受到孩子们喜欢她、信任她，她也真心喜欢上了这些孩子。

偶然的一次呕吐让凯蒂发现自己怀孕了，瓦尔特问：“这孩子是我的吗？”凯蒂过去可以轻而易举地撒谎，而且谎言可以带来好处。但这些日子她所经历的一切似乎改变了她。她不得不说实话：“我不知道。”

再后来，瓦尔特感染上了霍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凯蒂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消除毒害瓦尔特灵魂的怨恨之情，让瓦尔特更安心地离开人世。凯蒂现在全然不为自己考虑，脑子里只有瓦尔特。她唤着他亲爱的，恳求他的原谅。

瓦尔特去世后，凯蒂回到了香港。查理找她再续前缘，凯蒂尝试反抗，但在查理的坚持下，她再次屈服于自己的欲望。结束后，她说：“我不觉得我还是个人，倒觉得我是一只动物。一头猪或者一只兔子或者一条狗。哦，我不怪你，因为我也和你一样是个坏透了的人。我屈服于你只因为我想要你。但那个我不是真正的我。我不是那个令人厌恶的、像野兽一样的、放荡的女人。我和她已经脱离干系了。我自己的丈夫尸骨未寒，而你的妻子多萝西对我那么好，好到无法用语言形容，那个躺在床上渴求你的人不是我。它只是我身体里隐藏的野兽，就像一个邪恶的灵魂一样阴暗、恐怖。而且我已经和它一刀两断了——我恨它、鄙视它。而且从那以后只要我想起它，我就会恶心想吐。”让凯蒂再次犯错的是欲望，而她早已不爱查理。然后，凯蒂乘坐最早一班的船回了英国。

她的母亲已因病去世，她的父亲刚刚受到了出任巴哈马群岛首席大法官一职的聘书。她知道父亲这辈子过得并不幸福，贾斯汀夫人想法设法逼他为自己所用，女儿们也只是把他当成收入来源。凯蒂想和父亲和解，弥补过去。父女二人一同前往巴哈马群岛开始新的生活。谈及对未来孩子的期待，凯蒂说；“我想要个女儿，因为我想把她养大——让她不会走我的老路。当我回忆自己过去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我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我已经没机会重来了。我要好好地抚养我的女儿，让她成为一个自由而且独立自主的姑娘。我带她来到这个世界，养育她，爱护她，把她带大，绝不是为了将来某个男的特别想和她睡觉、甚至乐意包养她一辈子。”

至此，凯蒂破茧重生。

从波伏娃“存在主义”下的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再回到英国的凯蒂，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为了避开母亲的嘲讽而着急嫁人的洋娃娃，在经历了从未体验过的波澜后，凯蒂这个被社会塑造的女人开始向独立主体转变，减弱父权统治下对第二性欲望的控制而倾向于更多地考虑人性的理智与信仰，凯蒂心中作为“人”的主体性的一面逐渐觉醒。她对腹中孩子的寄语更体现了她在坎坷遭遇中受高尚的修女们等的影响逐渐摆脱了“内在性”和“他者”对自己的束缚，不再依附于男人，而是努力迈向个体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进而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在“内在性”中寻求超越。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http://www.baidu.com/link?url=foFgHqHdtTUSauHlz2fPuXdFBxnoZnqEDUQytPuQohkPX_02ofDfU33wN78dSn6P" \t "https://www.baidu.com/_blank)视角分析。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我是无意识的，由各种最原始的欲望和本能构成。凯蒂的本我追求虚荣和激情的爱。因为不想被别人嘲笑，她改变了自己寻求伴侣的标准，选择了一位她并不了解也不爱的人。但当其后来遇到充满魅力的查理后，她的本我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即使她要求查理离婚并与她结婚的诉求被拒绝，当她被丈夫带到边远的瘟疫盛行的村庄时，她仍无法控制自己对于查理的爱与思念。当凯蒂的丈夫因感染瘟疫去世后，她回到了香港，再次被查理诱惑。这充分展现了凯蒂本我对于欲望的渴望。此外，在瓦尔特与她坦白之前，凯蒂的内心也经历了数次的挣扎。生活在一个父权社会，凯蒂只不过是其家庭和婚姻的附属物。一方面，凯蒂不断被其本我推动着去满足其对于性与浪漫的爱的追求；而另一方面，超我却不断的压抑和抑制着这些原始的欲望。虽然并不爱自己的丈夫，但她仍然对于自己的不忠感到愧疚。以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人的自我在面临外部压 力时拥有作出妥协以保护自我的机制。当凯蒂的自我在面临压力时，她感到非常紧张，其自我自然遵循了“现实原则”。当查理抛弃了她以使她别无选择时，她决定面对现实，和瓦尔特一起去了瘟疫盛行的小城湄潭府。超我，也就是人类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它包含了我们为之努力的那些观念，以及在我们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准则时所预期的惩罚。很长一段时间，瓦尔特无法原谅凯蒂，对于凯蒂的安危也完全的漠视。凯蒂内心对瓦尔特充满了恨意与恐惧。刚到湄潭府的那段日子里，凯蒂感觉整天生活在地狱里。然而，凯蒂在湄潭府的经历使她逐渐觉醒。看到如此多的人处于生死边缘，以及修女们无私的奉献，凯蒂突然感到了在茫茫宇宙中自己的渺小。她逐渐开始理解了瓦尔特并重新审视了自己不忠的行为。她消除了自己对瓦尔特的恨意与恐惧，并尝试着与其沟通。她甚至加入了修道院，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故事的结尾，凯蒂回到了父亲身边，与父亲和解，并一同前往一个新的地方。最终，凯蒂的超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其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女性。

### 死的却是一条狗

“死的却是一条狗”出自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讽刺诗《挽歌：哀悼一只疯狗之死》。小诗如同一首朗朗上口的民谣，讲述了一个小镇上的好人：世人都说他与人为善/为行神道不分旦夕/怀有一颗仁慈的心/安抚天下友与敌/他每每装束齐整/日日为赤裸者穿衣。这位好人遇见一条流浪狗，两者友善相处，后来却发生不睦，小狗出于“私利”发疯咬了他。街坊四邻怒骂这狗丧失了理智，竟会咬这样一个大好人，纷纷断言那人一定会死。但奇迹从天而降/让愚氓们说谎出了丑/人的伤口很快痊愈/死的那个是狗。

尽管这首诗曾被当作儿童读物诫勉扬善抑恶，但其中也有隐喻。好人“装束齐整为赤裸者穿衣，无论敌友广行善举”，但连疯狗的毒力也对好人奈何不得，说明人的身上也含有毒。

在瓦尔特看来，他最初是好人。凯蒂愚笨轻浮、庸俗不堪，但他疯狂地爱着她。他总是时不时送凯蒂一些小礼物，要是凯蒂生病了，他就贴心照顾，关怀备至。他努力去喜欢那些凯蒂喜欢的东西，把自己隐藏起来，在她面前展示出无知的一面。就像好人对那只狗一样。

但当他发现凯蒂和查理的私情后，他暗中调查获得了证据，强迫凯蒂和自己去霍乱肆虐的湄潭府，想要以死报复凯蒂。他甚至没想过如果瘟疫过后他们还活着，要做什么。

在湄潭府，瓦尔特对凯蒂彬彬有礼，逢场作戏。他把爱倾注在那些唯他可依的瘟疫病人上。凯蒂因为自己曾瞧不起瓦尔特而鄙视自己，她不奢求瓦尔特的原谅，但她真心希望瓦尔特不要再为了自己的愚蠢而苦恼。但瓦尔特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而他的尖酸刻薄是一种自我保护，他的感情一旦受到伤害，他会迅速地关上心扉。当然，他最不能放下的还是他受打击的虚荣心，那是最难抚平的伤害，男人们非常在意妻子是否忠贞。他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曾经爱过凯蒂。这时的他，已并不像他曾经的深情表白中所描述的那样，无论凯蒂怎样不完美，他都爱着她。当得知凯蒂怀孕的消息，那句“我不知道”对他而言是无穷的讽刺。但他还是希望凯蒂离开这里，让人好好地照料。凯蒂却喜欢上了去修道院做事，并在工作中拯救了自己，不愿意离开。

最后，他选择主动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感染了霍乱。临死前，瓦尔特对凯蒂说；“别大惊小怪。我刚走了一段艰难的道路，不过我现在好了。”凯蒂感觉瓦尔特的灵魂是一只扑腾着翅膀的飞蛾，它的翅膀因怨恨而变得沉重。凯蒂全心全意地乞求他的原谅，希望在这最后关头，能够帮瓦尔特从痛苦的重压之下解救出来。此刻，瓦尔特终于忽然醒悟，凯蒂是那个好人，自己似乎是折磨凯蒂的疯狗。他因为忍受不了妻子的背叛想置妻子于死地而来到湄潭府，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人间的大爱而牺牲，是个伪善者。而凯蒂来到这里之后却被感化，完成了精神的觉醒，真心地奉献。但好人身上也有毒，凯蒂的毒是她不爱瓦尔特。濒临死亡的瓦尔特终于悟出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为自己的人生哀叹。他非常清楚地说出口；“死的却是一条狗。”

### 死亡

小说中有几次写到死亡，这些死亡一步步改变着凯蒂，也暗含着面纱的不同层次。

在湄潭府出去散步的路上她看到的一个倒毙在路旁的乞丐，这是凯蒂第一次见到死人。在那个病毒肆虐的地方，每天都有数人失去生命。沃丁顿说：“死亡让其他所有事情都变得微不足道。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人。你看着他，根本没法相信他曾经活着。很难想象，数年前他还是个小男孩，在山上奔跑着放风筝。”这与凯蒂内心的纯朴本真是那样接近，但这卑微的生命未经敷色，甚至衣不遮体，更无缘于面纱的世界。凯蒂忍不住呜咽着，泣不成声。

瓦尔特则不同，他陷入对凯蒂背叛的痛恨中不能自拔，用怪异可笑的假面掩藏真实的自我，以此来挑战虚伪、残酷的现实。他在自己身上做实验，通过死亡来解脱。他缓慢的死亡是面纱剥离、与命运妥协的过程；“我刚走了一段艰难的道路，不过我现在好了。”幽暗的灯光下的生命如一缕烟雾在空中消散。凯蒂在湄潭府对丈夫的情感由怨恨最终变成了愧疚和敬重，但是她还是不爱瓦尔特。瓦尔特的死亡也让凯蒂在悲痛过后终于可以放下以前的一切，重获自由。不仅是挣脱了死亡威胁的自由，还是摆脱了丧失了尊严的爱情桎梏的自由。瓦尔特的死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让她看到生命里新的希望，让她从人生的种种枷锁中得到解放。从此不再依靠男人，成为自由而且独立自主的女性。

不过，就连死神也对最深层的面纱无能为力。在凯蒂的亡母身上，庸常的力量继续着它的统治，嘲弄般地将一副滑稽的面纱强加给她——让她摆出她完全无法忍受的柔顺姿势。而她本人似乎保持着原有的面貌，就像这堆泥土一度为精神所寓居时那样。如果说沃尔特的死是一个哀婉的隐喻，贾斯汀太太则化身为一尊雕像，一个带着永恒面纱的纪念物，看上去很美，甚至很有气势。凯蒂回首自己的成长经历，明白自己会变成这样正是她母亲的“杰作”。凯蒂母亲的死去也让凯蒂父亲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是自由的、脱了束缚的生活。

小说中描述了诸多的人物的死亡，人物对死亡有着不同的见解，死亡对于女主人公凯蒂和其父亲意味着通向自由之路，让灵魂得到了解放。死亡对于修女们和瓦尔特来说，不仅仅是生命的终止，更是涅槃重生和生命的超越。他们在死亡中找寻到生命的本真，找到自我人生的价值。

### 中国形象

1919年冬，46岁的毛姆启程前往中国，同哈克斯顿一道游历了北京、上海、成都和香港等地。在这个几年前推翻了帝制的东方国家，一边是军阀割据下混乱、落后的市井生活，另一边是壮观的城墙、神秘的庙宇以及闲适优美的乡村景致。中国之行让毛姆收获了一出剧作、一本杂文集，以及一部精致的小说——《面纱》。毛姆在前言中坦陈这部小说酝酿多年，最初只是一个吸引人的离奇情节，并无任何人物的影子，是中国的见闻让虚无缥缈的幽灵有了活生生的肉身。

小说中有着大量关于中国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的描写，透过凯蒂的视角，这些景色带给人的感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凌乱破败与奇幻静美。对于香港，脏、乱、厌恶等词常用来描述凯蒂所面对的环境，这种反复使用的套话是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的一种固化的表述，常暗含着贬低的意味。凯蒂等人所代表的西方人之所以对中国城市有如此消极的评价，正是依托于英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优越感。18世纪中叶兴起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经济的繁荣，强盛的国力也助长了英国人的种族优越和傲慢。被丑化的异国形象有利于衬托英国的文明和发达，满足英国人不断强化“自我”的欲望，毛姆笔下落败的中国形象正是在这种英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塑造出来的。毛姆笔下的中国景观还呈现了一种与意识形态化形象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一座巍峨雄伟、虚幻奇异、美轮美奂、虚无缥缈的中国寺庙，凝视着它的凯蒂感到从未如此心旷神怡过，仿佛她的身体只是她双脚支撑的躯壳，她那纯洁灵魂的寓所。她对此深信不疑，就像信徒相信吃到的圣饼代表着上帝一样。对于凯蒂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寺庙是一种奇幻的存在，能够安抚她的情绪、净化她的心灵，帮助她暂时脱离现实的苦恼。这里寺庙代表的中国形象已完全被理想化，实则是毛姆自身主观情感的投射，带着浓重的乌托邦幻想色彩。毛姆利用凯蒂这个精神空虚的西方人在中国景观中得到精神慰藉的鲜明对比，构造了一个能够使人远离是非、洗涤心灵的圣地形象，其中寄托着毛姆对中国文明的美好想象和向往。

小说中一个重要中国人物形象是湄潭府的西方官员沃丁顿的情人——一位满洲格格。修女们提及沃丁顿曾在革命期间救过一家满洲贵族的命，此后其中一位满洲格格就抛弃一切跟着沃丁顿私奔。凯蒂一听说这种异国之恋的故事就浮想联翩，现在，对她来说，这满洲格格已经变成了一种象征，隐隐约约却持续不断地诱惑着她。那象征代表着一片精神秘境，令凯蒂难以捉摸。在凯蒂真正与满洲格格会面时，她惊奇地发现她穿着漂亮的衣服，落落大方地坐着，仪态端庄。涂满脂粉的脸上，一双眼睛机警地望着外面，泰然自若而又深不可测。她美得像一张画像一样虚幻，但她的优雅令凯蒂相形见绌。命运把凯蒂抛到中国来，她对中国的事物总是不屑一顾，甚至有些鄙视。中国的事物与凯蒂格格不入。然而此时，凯蒂似乎突然间隐约察觉到遥远、神秘之感。这里是东方，它古老、隐晦、神秘莫测。凯蒂从这位精致的女人身上匆匆瞥见了东方的理想和信念，相形之下，西方的理想和信念显得粗陋。这里的人们过着别样的生活，一种不同境界的生活。凯蒂感到诧异，眼前这尊圣像浓妆艳抹，双目顾盼机警，看着她，她所知道的世间的操劳疾苦都略显荒唐。这艳丽面容之下似乎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经验，不为人知，而未解之谜的钥匙就握在那指如葱根的精致修长的手里。揭开朦胧面纱的满洲格格所代表的中国形象寄托着毛姆对中国神秘、古老文化的崇敬。20 世纪初，西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精神信仰遭到极重打击，他们渴求从他国文化中找到信仰的对照进而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异国的乌托邦式描写实质上反映的是作者的愿望，期望从异国形象中汲取颠覆现实的力量，获取能使社会摆脱困境、自我超越的启示。

小说中沃丁顿作为凯蒂在中国内陆小城湄潭府仅有的亲密朋友，为凯蒂了解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凯蒂离开修道院时，她觉得自己不单是被关在修道院门外，也被关在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某个神秘的精神花园之外。她突然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沃丁顿为她指明中国的“道”正是凯蒂追寻的精神乐土，“道，就是路和行路人。那是一条永恒之路，万物都行走在其间，但道生于无，因为道本身也是物。道是有也是无。道生万物，万物皆循其道，万物复归于道。道是形却无棱角，是声音但不为耳朵听见，有形象但无形状。道是一张巨大的网，网眼如海洋，却恢恢不漏。道是万物的避难所。道不在任何地方，可是你不用探窗户就能看见它。不管它愿意与否，它都教会你万事行事的法则，然后任它们自由发展。依循道，谦卑的人能保全自己，驼背的人可以变得挺拔。失败是成功的奠基石，而成功潜藏着失败。但是有谁能知道两者何时交替。追寻和善的人会平顺如孩童。平和能使攻者获胜，防者安身。征服自己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万道归一，皆是虚无”的中国智慧作为毛姆构造的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实质上是毛姆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影射着毛姆开始突破意识形态上的隔阂，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试图从中国文化中找到超越自身文化困境的启示。 毛姆通过韦丁顿之口阐释的东方式人生真谛是经由整合和 再造出来的文化形象，是一种与现状不同、能补偿缺憾的存在。 其目的是为了迎合当时一战后同样迷茫的失去信仰的西方人， 激起他们反思自身文化、改变现状的动力。

小说中关于中国景观、人物、文化的形象描写始终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之间摇摆，景仰与贬抑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小说中交织出现。其中不难看出毛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向往，但也无法忽视毛姆作为英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

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伟大的跨越，中国人风雨兼程，创造了全新的生活。小说中，中国人在疫情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为力。但现在，当疫情来临时，事实证明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度过难关。我们要打破刻板印象，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把世界的故事讲给中国听。

**参考文献**

1. 毛姆. 面纱[M]. 蔡春露.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2. 刘慧敏.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女性的自由与解放——浅析波伏娃的《第二性》[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3):3.
3. 姜智芹. 非我与他者:英国文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J]. 东岳论丛, 2005, 26(5):3.
4. 梁永安.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Z4y1r752/?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09821ac818c8b05fb6dfb5579a6c277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r4y1E73u/?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09821ac818c8b05fb6dfb5579a6c2774>